

把美与诗凝铸在与莎士比亚的对话中

——方平先生对莎作的翻译与研究

李伟民

内容提要: 方平先生将毕生心血倾注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之中, 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领衔主译主编的诗体《新莎士比亚全集》是一部完全独立于以往中国其他翻译家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新译本, 他的诗体译本使中国读者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全集的新选择。他在实践自己的翻译主张的前提下, 通过翻译式的细读, 在莎士比亚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关键词: 方平 莎士比亚 翻译 研究

作者简介: 李伟民, 四川外语学院教授, 莎士比亚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莎士比亚与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Tracing the Poetic Beauty in the Dialogue with Shakespeare Mr Fang Ping's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Shakespeare's Works

Abstract Mr Fang Ping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to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Shakespeare's works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hakespeare Studies in China His "*The New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is a completely new translation The verse form provides a new choice to Chinese readers Mr Fang Ping also gave some original ideas in the Shakespeare Studies by his translating

Key words Fang Ping Shakespeare translation research

Author Li Weimin is professor at Shakespeare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is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Shakespeare Studies His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Shakespear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83517459@163.com

方平先生在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他用力最多、最勤的还是莎士比亚研究, 他除了主译主编了《新莎士比亚全集》这一中国莎学史上的世纪工程以外, 还翻译出版了其他一些莎士比亚戏剧、诗歌译本, 他 20 世纪 50 年代翻译了莎作《捕风捉影》《威尼斯商人》《亨利五世》《维纳斯与阿童妮》, 60 年代校订了朱生豪译的 8 部莎剧, 补译了《亨利五世》散文译本, 80 年代翻译了《莎士比亚喜剧五种》, 撰写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欧美文学研究十论》^① (2005 年) 以及几十篇莎学研究论文。在中国莎学研究领域, 方平先生的学识、人格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得到了同行的赞叹和后学的景仰。正因为方平先生在莎学研究上的杰出贡献, 他才被推举为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会长和国际莎士比

亚协会执行委员,这也是中国莎学学者在国际上第一次担任这个职务。

作为一个知名的莎士比亚学者,方平先生在莎学上的贡献首先体现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上,其次是根据自己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主张,再次是通过翻译式的细读,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莎学研究思想。

从20世纪40年代末涉足莎士比亚以来,方平将毕生心血倾注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构成了方平青春时代最难忘的人生篇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个接一个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面前,方平并没有停止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他冒着政治风险,偷偷翻译莎作,由此可见他对莎士比亚是多么的一往情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悲剧,只能偷偷摸摸,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小媳妇,夜半偷偷出去与自己以前的情人幽会,在那种紧张的心态下,可想而知,既没法谈爱情,也绝对搞不好翻译。”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使我在外国文学评论中留下了较鲜明的烙印。^②

一、理论与翻译实践并重

方平先生对译莎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在翻译莎士比亚的过程中,方平先生将自己提出的翻译理论应用到译莎的实践中。他认为翻译莎士比亚应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艺术形式和内容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原著的艺术性越高,越应该尊重其艺术形式,对经典的翻译,存形求神尤为重要,翻译莎作要“亦步亦趋”,“存形求神”,“文学翻译应是一种全方位、全信息的文化传递。”^③作为一个翻译家,作为一个对语言有很高要求的文学批评家,他对莎作中的语言特点及其语言的变化极为敏感。他重视莎作中的语言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大环境对语言的影响。他认为:莎士比亚的那许多杰作是不能脱离这么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语言环境的。^④“莎士比亚的戏剧生命就在于那具有魔力的语言。”因此,他“译莎剧特别注重原文句型结构,尽量设法在译文中保持原来的句型。”语言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就是借对客观事物的描绘把情感的象征性显露出来,同时给情感形式找到一种客观同构物,赋予情感以外形。“一旦进入莎剧的境界,你就会感悟到:语言对于这些剧中任务,不仅仅是彼此沟通时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语言也构成了最亲切最受欢迎的一门大众艺术。”^⑤语言艺术的情感外形化就是情感的客观化过程,也就是艺术符号化的过程。他认为,“在莎士比亚时代,“还不存在力求语言规范化、标准化的英语词典和英语语法书。处在流动、开放、发展中的英语构成的一张语言网络,富于弹性、留下宽松的回旋余地。”^⑥莎翁笔下的那许多最爱嚼舌的男男女女,不仅对于他们,言语成为“筵席”,成了游戏;“就连莎士比亚这位语言艺术大师本人,就连当时那么热烈地欢迎他的观众们,也是那么津津有味地在享受他们的语言筵席,玩弄他们的语言游戏。”^⑦

作为一个翻译莎作,与莎作语言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翻译家,他以大量的翻译实践作为莎作翻译批评的基础,看到莎士比亚对语言的尽情挥洒,以及观众对语言艺术的痴迷,或者说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戏剧演出的需要,这是方平作为一个翻译家不同于其他莎士比亚研究学者的地方。方平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本身对译者的修养、知识面、语言水平各方面的要求是相当高的”。^⑧因为,他将在莎作翻译中传达出“时代精神”,而且要让读者感受到“时代气氛”。在他看来,“时代精神”是一个历史文化标准,而“时代气氛”则是一个文学艺术与语言标准。只有将这两个标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称得上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上有了发言

权,也才能翻译好莎士比亚作品。

从1953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方平译《捕风捉影》中“译者的话”中,我们可以略窥方平的莎作翻译见解。即他始终认为,“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应该是诗剧的形式,而不是散文的形式。理想的莎剧全集应该是诗体译本,而不是那在普及方面作出贡献,但是降格以求的散文译本。比之散文译本,诗体译本更看重文学的形象性以及语言的形式、结构在传达原文的意境、情态等方面所起的作用。”^⑩“散文译本偏重于文字的通顺,而在语言的形式美方面往往注意不够。”^⑪这在50年后的《新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中得到了体现。方平曾援引别林斯基的话:“我们相信,为了用诗体完成最完美的莎士比亚剧本的翻译起见,翻译者必须自己也是莎士比亚;否则,他的翻译总不免有失实处——或者失实于概念,或者失实于形式,总是多少有点主观的。”^⑫“一定要把诗译为诗,又要从里到外,原封不动,这是件艰巨的工作,这里面似乎存在着人力克服不了的困难。把诗译为散文,可就损失了诗的芬芳、诗的色彩;幸而,那淳朴感人的诗的本质,还有希望留下来;所以说,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⑬

翻译莎作,方平认为,始终要为舞台演出服务,而为舞台演出服务,就应该在译文中加上适当的“舞台指示”。他说:“曹禺先生翻译的悲剧《柔蜜欧与幽丽叶》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有着相当成就的译本……从来没有哪位莎剧译者像曹先生那样在正文中大胆地加上为原文所没有的‘舞台导演词’等说明的字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许多附加的说明词,是帮助我们领会原著的精神的……一个译者除了致力于文字上的琢磨——他的本份工作之外,就必须多担负起些任务来。他首先要克服因为没有舞台欣赏经验而可能有的默读的倾向,绝不让一行行文字落在我们的眼里就变得孤立起来;他要尽可能的把每句话紧扣住动作,紧配着表情,让我们听见它的声音,看到它的神情,窥探出那说话者的活动的内心……这一个译本就是这一种翻译方法的进一步的实验。”^⑭“现代的莎剧版本有了充实舞台指示的趋向”^⑮。“对‘台上之本’说来,它的任务在于规定演员的台词,而无需把可以当场口头指点的舞台调度详细记录下来。当莎剧作为一种‘案头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时,简明而系统化的舞台指示就有了必要,否则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当‘案头剧’向所谓‘纯文学’的方向恶性发展时,舞台指示退化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点缀而已。”^⑯如果增加“舞台指示”有困难,方平认为,起码也应该在译本中添加一些“注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引导读者从台上之本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步向舞台靠拢。方平译莎剧之所以得到读者和莎学界的认可,还在于注释能帮助读者了解剧中环境和人物的思想性格。我们从《捕风捉影》中长达35页的内容充实、引述宏富的“译者的话”和“注解”、“考证”达到全书307页的一半篇幅的学术研究功夫中,可以看到处于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莎士比亚学者方平的绰约风姿,以及他对莎士比亚作品翻译所持的见解及其成功的实践。

二、紧扣文本、见解独到的莎评

作为一个翻译莎作与论莎各擅胜场的学者来说,方平先生的莎学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即他的莎学论文是在翻译的细读中始终从文本出发进行立论,既紧扣原作的创作意图,又探究作者的创作心态;既从宏观上把握莎作产生的时代特点,又从微观上深入挖掘莎作的深意,在这种细读式的批评中见解独到,文采斐然,在对问题的回答中注意引发读者的兴趣。同时,作为一个莎学研究上的过来人,方平的莎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即在莎学研究中注意到莎士比亚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注意从阶级的观点分析莎剧中的人物和

行动。“今天回顾我们过去对文艺的种种观点都免不了带有历史的痕迹和时代的烙印”。^④那时的外国文学批评领域的状况是，“当时批评界还没有获得独立思考的权利，在那样的压抑的政治气氛下，恐怕也是只能满足于那种外部研究的模式，拿时代背景的框子去套每一部作品，就顾不得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了，而是把“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式的阐述作为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了”。^⑤

尽管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莎学研究文章中，方平先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但时代毕竟在他的研究轨迹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即使是在莎士比亚喜剧研究上，方平仍然强调的是莎士比亚的反封建主义思想，他认为谈莎士比亚的喜剧，我们首先着眼的是它的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因此不能不接触到怎样看待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表现爱情这一题材。他主张阅读、欣赏莎剧要返璞归真，倾心诵读，那种将其架构分析得支离破碎毕竟不是明智之举。他强调在阶级社会中，“爱情和婚姻的问题总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分不开的，总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爱情的纠葛、婚姻的冲突，往往渗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容。”^⑥从这一大前提出发，方平才肯定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主义的爱情描写，表现的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特别是婚姻必须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爱情是一种纯洁的、值得珍惜的感情，决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淫欲邪念；这一些今天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是人文主义者向封建主义思想作斗争中首先提出来的。我们也正是首先从这一历史上的进步意义，给予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以及他的其他一些优秀喜剧以充分的评价。^⑦作为一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莎士比亚研究者，方平也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莎士比亚化”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命题，他比较清晰地归纳了“莎士比亚化”的主要特点是：“莎士比亚化”的第一个特点基本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⑧“莎士比亚化”的第二个特点：剧作家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以自己的才华。“……正是为了让角色可以更充分、更深刻、更富于诗意、更戏剧性地表达他们自己”。^⑨“其实也就是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和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的结合，也就是戏剧家和诗人的结合。”^⑩一切存在物都是两个对立面冲突与协调的统一体，爱情与肉欲、神性与魔性、勇敢与懦弱、抗争与退让、尊贵与卑贱、喜剧与悲剧都能够在这部莎剧中找到根据。方平是20世纪80年代以莎学学者的身份介入，参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莎士比亚化”这场讨论的莎学研究者之一，他从莎士比亚作品的角度介入这场讨论，观照的视点显然不同于文艺理论家的阐释。

对《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方平也主要从阶级和剥削的角度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他认为夏洛克的“‘积财就是积福’，当夏洛克提出他这个人的信条，为自己的重利盘剥找‘合法’的根据时，实际上也就是替整个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把他们共同的内信，借宗教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上，货币资本主夏洛克希望能够和商业资本主义主安东尼奥取得某种谅解，减少误会，尽可能调整彼此间的关系。”^⑪“‘守财就是进财’，这句话同样值得注意。它既是夏洛克这一个一钱如命的吝啬鬼的性格化的自白，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为了掩盖其残酷剥削的实质而不断散布的一种论调。”^⑫夏洛克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不可能站在深受其害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对不劳而获的可耻的吸血勾当，进行有力的揭发和谴责。”^⑬方平认为，谈其中的“友谊与爱情”，属于“津津乐道”，是“还可以研究”^⑭的。而《威尼斯商人》中所涉及的种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是通过“剥削阶级集团内部矛盾”^⑮这种特殊方式表现出来的。方平的结论是：“在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就它的全体而论（决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一向

利用操纵在他们手里、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法律，把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当作牲口般驱使，虐待，又企图当作牲口般宰割，血淋淋的一磅人肉，不应该拿来作为对于犹太人异教徒的反宣传，作为对他们歧视、迫害的口实，因为这一切本是荒唐无稽、别有用心的谣言罢了。”^③重新阅读方平的这篇论文，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风风雨雨在字里行间留下的印记。正如方平自己所说的，论夏洛克“写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和已经来到之际，有时白天被迫写检查，晚上躲在家里苦苦地写这篇论文……这篇论文虽然表达了我一部分见解，写法却是成问题的。它没有能从莎剧本身出发谈莎剧，好些地方分明是从政治概念出发谈莎剧……这是一篇谈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的文章，怎么充满着一股肃杀之气？……在那史无前例，风狂雨骤的年代里，内心紧张极了，象走在绷紧的钢丝索上，又怎么能写出有说有笑的文章来呢？……在那篇扭曲了莎士比亚戏剧面貌的论文里，我看到了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自己的被扭曲了的精神面貌（尽管当时还自以为在暗暗地跟它顶呢）。”^④

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抱着美好的理想，深信人类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的基调；而贯穿在他那些最优秀的喜剧中，两个相互联系着的主题思想是：清晰地表达出要求个性解放、热爱现实生活、歌颂真挚的爱情等人文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拿笑声做武器，对于各种各样阻挠社会向前发展的封建保守势力，给予无情的讽刺。”^⑤方平相信莎士比亚戏剧展示出，人对理想的美与爱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求，人们常常以全部生命的热情甚至以整个生命为代价去追求理想中的美与爱，并把这种追求作为他全部生命意义来看待。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对莎学研究的深入反思，促使方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所写的莎学论文更多地从艺术的角度分析莎士比亚喜剧的艺术特点，例如，他认为《仲夏夜之梦》的“艺术结构非常巧妙”^⑥。《仲》表明了剧作家充分意识到在那“不以为戏而以为真”的传统的戏剧观之外，另外存在着一种戏剧观，他甚至把整个喜剧的表现重心放在“间离效果”上。^⑦毫无疑问，方平先生在莎学中的这些独到的见解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典范，也为莎学研究提供了中国学者的新鲜阐释。

进入 21 世纪以后，方平当选为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执行委员，参加了多次国际莎士比亚学术研讨活动，在这些学术研讨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方平了解了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进展，也接触和观赏了戏剧、电影、电视、音乐形式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为此，他也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使国内读者了解了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有关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者，方平的眼光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文本，他认为莎剧被搬上银幕有舞台演出不具备的优点，但是，“莎剧搬上银幕曾经面对的各种问题，怎样摆脱明显的舞台演出的胎记，自觉地意识到电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新品种，从而追求属于自己的艺术手段。”^⑧而他也对西方“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莎剧影片中，爱的错位变成了性的错位；从异性恋一变而为同性恋；从原来无伤大雅的‘爱的游戏’变成了东方人的道德观念所难以接受的‘性的游戏’。要欣赏这部影片，必须彻底抛开原著”^⑨提出了批评。莎士比亚的那许多杰作可以认为是西欧戏剧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的一个标志。但莎士比亚可不像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大师们那样幸运，他的作品落进了现代先锋派等的戏剧家手里，尤其在电影中，被解构了，被异化了，脱胎换骨了，面目全非了。^⑩对于这种现象，方平也表现了解和困惑。

弹指一挥间，从事了莎学翻译和研究已经 60 多年的方平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焚膏油以继晷 恒兀兀以穷年”译莎论莎 治学严谨 态度谦逊 提携后学 追求完美的大家

风范令人景仰。他热爱生活,挚爱莎剧,他认为莎士比亚运用他的全部艺术才华在作品中表达的主题思想,“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既是莎士比亚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之一,又是人类永恒的追求。^⑤这个理想更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对生活的完整理解。

注解【Notes】

①方平先生 2005年出版的《欧美文学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涉及到莎士比亚研究,时间跨度达 20多年,但也收入了他近年来对莎学研究的新思考。参见方平:“莎士比亚的一个轮廓”,莎士比亚:《新莎士比亚全集》(十二卷本),方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4。文章中多处参考了方平先生主译主编的《新莎士比亚全集》,不再一一注明。

②③⑧⑨⑩⑪⑫⑬⑭⑮方平:《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9,352,55,316,318,181—182,191,193。可参见方平:“我的表白”,《外国文学》6(2002):83

④⑥⑦参见方平:“一个诗的时代——谈莎士比亚和他的剧中任务、他的观众的语言观”,《外国文学研究》4(1990):5,5,7。对于莎剧中的双关语,方平认为反映了剧场中观众的欣赏心理。

⑤方平:“漫谈卞、曹两家的莎剧优秀译本”,《外国文学》6(2003):100。这个观点方平在谈到莎作翻译时多次在不同的文章中表达过。

⑩⑪⑫⑬⑭⑮莎士比亚:《捕风捉影》,方平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1,1,3—4,634,635。还可参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方平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当时正处于青年时代的方平精力充沛,在这段时间翻译的莎剧译本,除了莎剧本身外,“译者的话”、“评注”、“考证”、“附录”占了很大的篇幅,无疑是介绍、研究这些莎剧较为全面的论文。

⑯⑰方平:“人性的探索者——悲剧时期的莎士比亚”,《外国文学评论》1(1994):103,109。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方平更加注重从人与人性的角度认识莎士比亚。

⑱⑲⑳方平:“前言”,《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 5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4,6。历经文革劫难的方平 1978年再次校阅这些译本时,参考资料已经不全,无从再次核对了。

㉑㉒㉓方平:“什么叫‘莎士比亚化’——谈剧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关系”,《外国文学研究》3(1982):3,9,10,13。方平认为“莎士比亚化”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人物有自己的才华、更有诗意,能更戏剧性地展示人性;剧中人物与剧作家的感情交织在一起。

㉔㉕㉖㉗㉘㉙方平:《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99,101,102,103,120,354。在这本书中,收入的一些文章还留下了思想受禁锢的痕迹。

㉚㉛方平:“小精灵蒲克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观——《仲夏夜之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1987):91,97。以蒲克入手,从多个角度特别是艺术的角度概括了莎氏喜剧的艺术特点。

㉜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460—461。

责任编辑:苏 晖